

当前世界经济风险及其防范化解

□ 傅小强

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加速调整，面临增长动能衰退、贸易保护蔓延、金融市场震荡、全球合作乏力等多重挑战。随着多种因素加速演进，世界经济笼罩于不确定性的阴云之下，增长转型动能不足，金融风险叠加上扬，多种风险交织共振等问题日益严峻，甚至有演变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面对这一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各国各自为战难有成效，国际团结协作才是正解，全球行动刻不容缓。

现实挑战不容低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现实挑战增多，各种风险叠加累积，世界经济体系正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增长放缓的普遍困境。在政策不稳加剧、贸易紧张难消、市场需求减弱等作用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多国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8%（远低于2000—2019年3.7%的平均水平），预计发达国家增长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3.7%。此外，世界银行预警，诸多发展中国家正陷入增长疲软困境，2025年60%的发展中国家将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步伐放慢。

贸易保护的国际挑战。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异常混乱。美国肆意实施贸易霸凌，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伙伴开征所谓“对等关税”，甚至一度将实际关税水平提升至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值，重挫全球贸易流动。世界贸易组织预计国际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势头被打断，2025年恐萎缩0.2%。除关税外，妨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非关税壁垒也层层加码，仅2024年初以来，全球就新增了150多项限制性贸易措施。

金融市场的震荡调整。受地缘政治环境恶化、贸易环境不稳、技术壁垒加固、关键矿产博弈愈演愈烈等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信心动摇，波动频繁。其中，全球股市约半数市值集中于美股，结构性弊病凸显，而美股受特朗普加征关税不确定性影响，上半年走出深V行情，一度大幅下探。全球债市受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借贷规模上扬影响，面临需求不足、债券收益率上升困境，甚至出现多国国债的抛售潮。从汇市看，长期强势的美元指数大幅走弱，黄金等避险资产受追捧，国际金价自2025年4月

突破3500美元/盎司后，维持高位。

改革难推的全球治理。与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变数增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治理体系滞后严重、改革迟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变化。部分国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只希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渔利，而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更无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受其掣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份额改革裹足不前，世贸组织多边谈判缓慢、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包容性严重不足，治理效率低下。

中长期风险值得警惕。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大，世界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风险更需警惕。

不确定性阴影挥之不去。经合组织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显示，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不仅将加大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还将导致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其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正随着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断升高。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面临美国经济前景“确定的不确定性”影响，其决策独立性也面临严峻考验，未来还可能通过“美元潮汐”持续外溢风险。此外，在世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背景下，各国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乃至极端冲突，导致财政政策急速逆转。

经济增长转型动能不足。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世界经济寻求增量的重要依托。然而，一些国家的绿色转型政策，实施不连贯、常反复，效果大打折扣。例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出现“废新还旧”，不仅放缓对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还推动传统能源开发“狂飙急进”，拖慢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同时，全球数字鸿沟难以消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and 数字技能培训上远远落后。更有个别国家设立屏障，阻碍全球数字联通与合作。此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尚未完全产业化，且面临政策滞后、标准不统一、就业冲击等问题。

潜在金融风险复杂叠加。过去15年，一半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翻了一番，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更呈“滚雪球”式增长，债务违约风险明显上升。一些发达国家债务的GDP占比

也接近二战后峰值，频繁拉响债务警报。随着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偿债压力不断加大，各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趋于加剧。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占全球金融部门的比重已超过50%，其向传统金融体系传导风险的可能正不断加大。此外，部分国家过度逐利，过快放松加密货币监管，过急与传统金融体系融合，进一步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甚至有传导联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

其他各类风险交织演进。动荡变革期下地缘政治回潮，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重要能源资源和关键通道安全的影响将进一步显化，各国对外贸易投资关系亦将因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竞争形成的“政治距离”而进一步疏远，更遑论个别国家加速“脱钩断链”，使“平行市场”阴霾加重，严重扰乱全球经济的正常秩序。部分国家和地区为应对日渐恶化的国际局势，甚至转向“战时经济”模式，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这种做法在挤占民用经济投入的同时，恐引发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此外，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加大粮食和能源危机风险，进一步威胁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破解世界经济难题需各国团结合作。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要加强团结协作。在风高浪急中“同球共济”，是防范化解风险、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凝聚发展共识，提升世界经济确定性。其一，重申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共识。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回港湾中去”“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其二，树立“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的共识。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政策的透明度、确定性、可预期性，对于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培育发展动能，拓展世界经济新机遇。习近平主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新动力”。要想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把握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碳技术等重要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同时，坚定不移支持知识、技术、人才跨国流动，着力弥合数字鸿沟、技术鸿沟、智能鸿沟，让更多国家搭上经济发展快车，助力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科技红利全人类共享。

防范重大风险，筑牢世界经济“防洪堤”。当前，金融风险的联动性日益增强，各国无法独自实现金融稳定，必须加强合作。特别是，着力维护自身金融稳定，减少金融脆弱性的外溢与传染；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经济、加密货币等新兴领域的风险挑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更加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加强金融风险数据共享；深化债务管理，改善债务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加强多边债务协调。此外，在地缘、安全、科技等领域，各国也应增进互信、强化合作、加强治理，防止其他领域问题冲击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强化全球治理，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习近平主席强调，“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有效、有为的全球经济治理”。面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停滞不前，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零和博弈逻辑与“合则用、不合则弃”思维，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开放包容、公正高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坚持以平等协商为基础，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恢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坚决消解治理赤字，加快填补新兴领域治理不足。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新加坡贸易便利化的创新实践

□ 张文馨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国家总人口约600万，但7小时飞行半径可覆盖亚洲28亿人口市场，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世界贸易、金融、航运中心。作为一个深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逐步形成了贸易便利化优势，使其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

新加坡属外贸驱动型经济，外贸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设有11个自由贸易区，签署30份自贸协定，在全球20个国家（地区）设有30余个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代表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贸易选择。新加坡港与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通航，形成200多条航线网络，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其全球领先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持续迭代，电子贸易通关系统Trade Net与国际贸易平台（NTP）等数字化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广泛的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新加坡凭借优秀的制度设计和高效的管理，将区位优势发挥到极致，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深化政策支持完善贸易投资环境。新加坡进口商品中，应税货物仅包括石油、酒类、烟类和机动车辆等4大类商品，除此之外的所有商品均为非应税货物，仅需缴纳消费税，无需征收国内货物税和关税。新加坡外资准入政策宽松，对外资无一般性要求或义务，绝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外资的股权比例等无限制性措施，仅对少数的行业出于安全风险、市场风险管控的原因实施管制，包括银行和金融服务、保险、电信、广播、报纸等，对这些行业的投资需取得政府批准，特定法律也可能对其设置外国股权限制、特殊许可或其他要求。同时对外资企业实行无差别国民待遇，境内实行统一的财税优惠政策，外汇进出自由，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于2001年6月启动全球贸易商计划，为符合要求的贸易收入提供5%或10%的优惠公司税

率，为期3—5年，该计划适用于以新加坡为基地从事国际贸易的任何公司。

强化基建支撑推动港口高效发展。新加坡拥有亚洲先进的宽频互联网体系和通信网络，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固定宽带下载速度常居世界首位，支持其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等多行业发展。为改善海上作业的安全和效率，新加坡在2025年年中实现5G网络全面覆盖码头、锚地、航道和登船区。在优化港口网络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广泛采用自动导引运输车辆和远程操作式起重机，在自动化码头建设和智能化管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正在建的大士港预计2040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为进一步减少碳足迹，新加坡港务局试点让部分船舶使用生物燃料作为动力，利用更环保的集装箱驳船运输，同时积极部署电动和其他低碳替代燃料驱动的集装箱装卸设备，并和太平船务（PIL）于2024年完成首次低碳绿色货运试航。

创新数字赋能提升贸易便利水平。新加坡是国际上最早应用电子网络系统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国家。早在1989年1月，新加坡政府就率先推出Trade Net，整合了进口、出口和转运文件处理程序，只需通过单一入口即可将一份申报单提交至多方监管机构，将电子申报许可申请批准时间压缩至10分钟，开创“单一窗口”服务范式。如今Trade Net与NTP并行运行，实现新加坡海关与国内外其他贸易监管机构进行数据交换。2023年，新加坡突破了全球贸易数字化的界限，利用“电子可转让记录”完成了从新加坡运输液体化学品到泰国这一全球首宗“无纸账”跨境贸易。同年，中国—新加坡第一个贸易场景的全环节数字化实单试点顺利落地，实现中粮工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新加坡—丰公司集装箱出口的全环节电子单证线上流转和全程一站式实时追踪，出口单证处理效率提高80%，人工成本

降低30%。

拓展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互联网络。新加坡沿袭英国法体系，形成了与国际规则相对接的高效、完备的法律法规。税收方面，目前已与约100个司法管辖区签署了避免双重税收协定、有限双重税收协定和信息交换安排，减轻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时的税收负担。同时积极构建多层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2020年6月与智利、新西兰签署全球首份《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本。随后5年间，与澳大利亚、英国、韩国、欧盟等经济体相继签署数字经济协议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覆盖亚太与欧洲的数字贸易圈。在国际商业领先的仲裁中心，新加坡被公认为亚洲领土的仲裁中心。为持续发展法律服务业并扩大法律国际化和输出的范围，新加坡于2015年1月启动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CC），并由来自新加坡的专事法官以及来自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国际法官组成仲裁庭。

新加坡贸易便利化的创新实践核心在于将国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与国际互联有机结合，为全球提供了有益启示。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塑造一流营商环境。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的关键，也是集聚全球资源的核心竞争力。新加坡通过实施极简税制、高度开放的外资准入政策以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借鉴其经验，需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坚持推进“放管服”改革，在保障国家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放宽市场准入，构建统一、透明的监管体系，并探索设计精准、高效、与国际接轨的激励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跨境运营合规成本，提升市场活力与吸引力。

以智能化绿色化双轮驱动基建升级。先进、可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是支撑现代产业体系高效运转的基础，也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的升级空间。新加坡持续投入建设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和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港口设施，并积极布局绿色港口，为巩固其航运枢纽地位提供了强大硬件保障。借鉴其经验，应前瞻性规划和持续投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万兆光网、算力互联网等，加速推动关键物流枢纽的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实现基建与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智能+绿色”双轨赋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以全链数字化优化贸易流程规则。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正重塑贸易价值链各重要环节，贸易流程的优化升级既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支点。新加坡从Trade Net首创“单一窗口”到全球首例无纸化跨境贸易，始终通过系统整合与规则突破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借鉴其经验，应强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的贸易数据整合共享，提升“单一窗口”在监管、物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水平，同时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试点，实现从“流程优化”迈向“价值创造”。

以规则对接与平台构建拓展全球网络。全球化深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将自身发展需求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路。新加坡通过技术标准先行以及模块化输出，将本国优势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构建起以自身为节点的国际合作生态。借鉴其经验，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将本国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提案，加强多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加快商签高标准的数字和绿色领域国际经贸合作方案，构建多层次国际合作网络，提升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指在分工背景下，产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最终交付给消费者，实现跨国生产供应网络稳定、可靠、持续、可控运行，从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竞争力和社会民生福祉。通过国家战略协调、企业风险管理、国际规则协调、技术标准赋能、风险监测评估等综合施策，共同构建一个能够有效预防、抵御、适应和恢复内外部冲击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这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治理的有效目标。

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新兴经济体竞争激烈，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产业链供应链绿色智能化也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其一，安全地位提升，各国重视关键物资供应安全。美、欧、日、澳将关键矿产资源的获取、储备、定价等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不断加大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审查与风险评估力度。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要求2030年前实现战略原材料10%本土开采、40%本土加工、25%回收利用的目标。其二，区域趋势增强，区域内合作紧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整合，美墨加协定（USMCA）要求汽车75%部件在区内生产方可享受零关税，推动北美汽车供应链深度整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贸易、投资、产业链、价值链融合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引擎。其三，数字赋能加速，提升效率和透明度。数字技术重塑供应链形态，物联网实时追踪进货损耗索赔率下降54%，人工智能优化物流路径使运输效率提升30%，区块链实现食品供应链全程可追溯。其四，绿色可持续受关注，融入环保社会责任理念。联合国报告显示，超过70%的世界500强企业已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目标纳入其年度规划，加快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转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格局的新演变，给我国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是安全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脆弱性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比如，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锂、钴、镍等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24年锂原料进口依赖度约60%。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出口，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受阻。多重贸易壁垒使中国企业年均合规成本大大增加。如欧盟将于2026年实施“最严碳壁垒”政策，对进口钢铁、铝等产品征收碳排放税，届时中国钢铁企业每出口一吨钢材将额外支付22欧元碳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新能源汽车税收抵免与北美供应链绑定，迫使比亚迪墨西哥工厂追加15亿美元投资调整供应链。三是产业竞争压力加大，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从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看，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以527亿美元补贴吸引台积电、三星赴美建厂，欧盟《净零工业法案》为本土电池厂提供30%成本补贴，中国锂电池企业合规压力增大。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替代”看，凭借成本和政策优势，越南1/3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迁入，墨西哥借USMCA规则发展“近岸外包”，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总额下降约20%。四是供应链成本增加，削弱产业竞争力。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全球供应链区域化重构可能导致电子行业成本增加15%—20%，产业竞争力受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2026年全面实施后，中国钢铁行业每吨出口将额外支付约50欧元的碳成本。据波士顿咨询测算，截至2030年中国对欧出口的六大高碳行业利润率压缩3—8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持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政策保障。制定国家层面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明确关键产业、核心产品清单及目标路径。健全供应链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外资审查机制，推动制定供应链韧性标准、数据安全与跨境规则。构建应急响应与韧性提升机制，明确危机状态下的协调指挥、资源调配、替代方案和恢复重建流程。丰富政策工具箱，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治理新趋势

□ 林炜炜

科技等多元化政策手段，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核心环节本土化，提供信贷优惠和风险担保鼓励供应链韧性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通过完善的政策组合拳，系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强化战略导向攻关，聚焦高端芯片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在先进工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的短板，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建设创新联合体，建立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的上下游企业价值共创体，打通产学研用转化堵点。筑牢基础能力根基，加大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投入，布局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供应链关键环节本土化替代，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基础。

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和产业转移。国内区域协同方面，强化城市群分工，在长三角、粤港澳等枢纽区域布局高端制造与研发中心，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创新跨省协作机制，建立区域产业转移补偿基金，破解要素流动壁垒。国际梯度转移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分布，将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和国家，加快近岸多元化生产布局。建立产业链安全评估负面清单，对符合安全导向的转移项目提供跨境投资税收抵扣、海外园区基建补贴。支持头部企业在战略节点建设区域总部和物流中心，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主动引领多边机制，在联合国、WTO、G20等框架下推动建立供应链安全通用标准与透明度准则，倡导“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原则，协调各国建立统一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框架与数据交换机制。构建区域性协作网络，深化与东盟、RCEP等区域组织的专项合作，共建区域性供应链监测平台与危机响应联盟，试点跨境关键物资储备共享、物流通道备份等机制。主导新兴规则制定，聚焦数字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等新领域，联合产业界与标准组织，牵头制定人工智能溯源、碳排放追踪等技术规则，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未来，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建设更具韧性的产业集群、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风险预测响应、维护多元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民生福祉，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